

建筑文化与思想文库

边缘空间 ——当代建筑学与哲学话语

汪原 著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建筑文化与思想文库

边缘空间——当代建筑学与哲学话语

汪 原 著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空间——当代建筑学与哲学话语/汪原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建筑文化与思想文库)
ISBN 978-7-112-11594-5
I. 边… II. 汪… III. 建筑哲学 IV. TU-0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775 号

责任编辑: 唐 旭 黄居正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袁艳玲 兰曼利

建筑文化与思想文库

边缘空间——当代建筑学与哲学话语

汪 原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天成排版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8¼ 字数: 205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一版 201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7-112-11594-5
(1884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对哲学的兴趣始于自己初学建筑之时，记得当年老师总是重复的一句话：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必须有自己的建筑哲学，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在随后的时间里，虽然也半生不熟地读了一些与哲学相关的著作，但始终如坠云雾，不得要领。真正开始有目的而仔细地研读某一位哲学家的著作，则是在东南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一次偶然的阅读，即被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思想所吸引，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与研究城市的方法也成为自己博士论文主要借鉴的理论。当时为了完成论文，对这位哲学家著作的阅读，只能算是囫圇吞枣，遗留的问题和困惑实在太多，心中便生起了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有了去读哲学的念头。但当自己有幸被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收为弟子，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真正系统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方知一时的冲动所带来的莫大的“苦楚”。

在这段学习期间，由于还要兼顾原单位的教学工作，于是我奔走在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两校之间，奔走在艰辛的读书和繁忙的工作之间，奔走在哲学和建筑学之间，奔走在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之间。中途时有不堪重负之感，还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是，邓晓芒先生的教诲、鼓舞以及人格的魅力，使我有坚持的勇气和动力。

通过两年多的学习，感觉自己在思想上疏朗明晰了许多，也渐渐觉得一只脚似乎跨入了哲学的门槛。游走于建筑学与哲学之间，自己也始终在寻找两个学科不同层面的对话，甚至试图模糊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但由于建筑专业的背景以及研读哲学的时间尚短，至今感觉始终处在哲学的边缘，未能真正登堂入室而窥其堂奥。因此，收入文集的文字大多是在这种边缘状态中对空间、建筑和城市诸多问题的思考。其中许多文字已发表于各类期刊，此次为了便于结集出版，将文章重新进行了归类，也算是对自己思考的一个小结。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邓晓芒先生，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也要感谢《建筑师》杂志的主编黄居正，没有他的推介，出版几乎不可能。同时还要感谢编辑唐旭女士认真仔细的编校，避免了许多错漏。

汪 原

2009年8月于华工喻家山麓

目 录

前言

迈向空间的生成过程	1
“异托邦”概念的两个文本比较	6
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批判	13
一、思想历程	13
二、日常生活批判	16
三、空间理论批判	19
四、空间的生产	22
五、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24
六、从城市理论到城市实践	25
七、结语	27
“异托邦”对当代建筑学的启示	29
“日常生活批判”与当代建筑学	35
女性主义与建筑学	42
一、本质主义或社会性别差异论	42
二、构成主义或社会性别构成论	44
三、女性主义建筑学的可能性	45
四、结语	47
建筑，一个时代的面相——本雅明建筑体验之现象	
学维度	48
当建筑学遭遇现象学	55
视域与手段——艺术家与建筑师的当代融和	62
零度化与日常都市主义	67
一、现代都市与零度化	67
二、日常都市主义	68

三、日常都市主义的空间实践	70
四、结语	73
“生成”、“创造”以及形式化的悖论	74
一、“生成”与“创造”：人类两种基本思想维度	74
二、世界观的生成论与分析方法的理念论	75
三、源于日常生活的建构	77
四、结语	77
生产·意识形态与城市空间	79
一、意识形态的城市空间	79
二、生产性的城市空间	80
三、列斐伏尔对城市发展与研究的影响	82
从“flâneur”到城市的“步行者”	85
一、新型城市空间形态的出现	85
二、城市中的“flâneur”	86
三、城市中的“步行者”	88
四、结语	91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城市意象》之批判	92
一、“行为革命”与城市意象研究	92
二、城市意象研究及其局限性	93
三、城市意象的社会文化差异	95
传统城市起源说的颠覆——简·雅各布斯《城市的经济》 之解读	99
一、“新黑曜石”——一个“源初城市”的模型	99
二、社会分工、城市起源以及生活的城市	101
三、启示	102
理论与实践的趋近——关于“汉正街”研究视角和 方法的思考	105
一、介入汉正街	105
二、“金昌大厦”与日常性	106

三、“扁担”：汉正街的陌生人	108
四、“打货”者与“零度空间”	109
五、结语	110
 立面：作为一种方法——读《立面的误会》所想到的	111
一、关于梁思成中国建筑思想的“矛盾”和“悲剧”	111
二、立面：作为一种方法	115
 现代建筑史的书写与规训——解读《我的建筑师：一位儿子的旅程》	117
 从“华南现象”迈向岭南学派	121
一、“行动”与“效果”	121
二、技术理性与社会述求	122
三、走向“岭南学派”	123

迈向空间的生成过程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年)是法国最多产并有着传奇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在横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其理论思想曾多次被法国思想界推上高峰,成为学人趋之若鹜的显学,也曾多次淡出中心,备受学术界的诟难和冷落。尽管如此,亨利·列斐伏尔早年对马克思著作的译介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由于政治原因,他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了社会学研究,并在1974年出版了集其哲学和社会学思想于一体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在书中,他对空间概念及其历史的系统研究和重新诠释至今对法国的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文学批评以及建筑学和城市科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是在什么背景下被纳入建筑以及城市理论视野的已无从查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建筑学家、哈佛大学建筑理论教授迈克尔·海斯(K·Michael·Hays)将亨利·列斐伏尔的文本(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哲学理论)堂而皇之地收入其编著的“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一书。虽然书中同时还收入有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的言论,但不同的是,从《空间的生产》中所摘取的篇章几乎都是关于建筑和空间历史的讨论。^①也许在迈克尔·海斯的心里,亨利·列斐伏尔就应该是与塔夫里、罗西和柯尔柯亨等建筑理论大匠具有相同的地位。

亨利·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理论的建构源于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分歧。在对现代认识论的思维批判的基础上,他对那些将空间视作是“精神的事物和场所”的哲学思想以及相关的建筑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符号学。他认为“当由文本组成的符号应用于建筑空间和城市空间时,人们便不得不停留在纯粹的描述层次。任何试图应用符号学的理论去阐释社会空间的企图,都必须确实地将空间自身降至一种信息或文本,并呈现为一种阅读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历史和现实的方法。”^②

针对符号学的这种缺陷,亨利·列斐伏尔一方面将主观性引入从政治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空间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精神空间与社会和物质的关联域进行整合,从而将符号学“文脉化”。他认为,空间的精神、物质和社会尺度不应相互分离,并且试图阐明一种一元化的空间理论。为了进一步弥补传统的二元论即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的分歧,

亨利·列斐伏尔还引入了社会空间、社会生活空间以及社会实践、空间实践的概念，并利用黑格尔关于生产的概念，形成了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实际感知集为一体的一元化的空间理论。^③ 这种一元化思想的灵感部分来源于物理学中空间、时间和能量相互关联的理论，同时还受到超现实主义寻找人类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结合点的启发。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空间，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才能将空间二元论式的问题凸显出来。人们应该关注的是空间的这种生产过程，而不是在空间自身或空间内部的事物。

在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中，空间的生产是一个核心概念。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分析的基础上，亨利·列斐伏尔指出：资本的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另一种流通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创造出一个更为整体的物质环境。由于过度积累和资本转化的循环性和暂时性以及在建成环境中过度投资而引发的新的危机，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空间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些矛盾的含义进一步体现为对现存环境的破坏，从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出新的空间。因此，空间的生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它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了更多的空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式之一。资本主义依靠全球化的银行和商业网络，依靠高速公路和机场，依靠能源、原材料和信息流动，对所有的空间进行抽象，并将自然空间和其特性如气候、地形都降至为社会生产力运行的一些材料。地表、地下、空气，甚至是阳光都变成可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产品；空间则被利用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环境和生活的组成、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依赖空间的生产 and 空间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城市、区域、国家、大陆的空间分布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一样是用来增加生产的，是用来使生产关系得以再生产的。

在这种状况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距离已崩溃，人们在历史过程中对自身所处的场所的感知也被扭曲，而且由于生产的不断重复和循环，甚至时间也被打上了商品的和空间的烙印。

在对社会空间的引入中，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必须考察三个重要的环节：即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和表征空间 (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实践涉及空间组织和使用的的方式。在新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空间实践使日常生活和城市现实之间体现了一种紧密的联系。空间表征涉及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科

学家、规划师和专家治国论者所从事的空间。这种空间在任何社会中都占有统治地位，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

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西方城市大都经历了这三个环节。但 19 世纪之后，尤其是现代主义盛行之后，城市空间的历史性被抽象性所打断和代替；城市空间与自然、历史、宗教、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因此被忽略了。以资本主义为背景的现代性将人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进行了分类化和惯例化，并通过钟表计时将时间与地点或空间相分离，致使人的活动变成了有钟表的时间控制的机器。抽象空间占统治地位即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空间及其各个场所都被抽象空间所侵占，并席卷和吞噬了所有未被商品化的剩余的城市空间。生产力的全球化趋势使抽象空间本身所具有的断裂性和匀质性得以加强，并试图采用抽象空间去解决所有的空间矛盾。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性质从本质上导致了一种潜在力量去抵抗这种全球化所可能形成的同一性，并使异质性空间的出现成为可能。

因此，亨利·列斐伏尔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过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思考引入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融为一体。由于以往对空间的认知没有根植于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因此他对以往空间认知的确实性提出质疑。同时，为了与空间产品的政治经济组织取得平衡，他还导入了日常生活的概念，一种试图说明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侧重对日常生活的客观性理解)，并且在社会调查中将异质性的关注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这种将日常生活结合进社会过程的观点并非亨利·列斐伏尔所独创。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④在其生后出版的《生活世界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 World)一书不仅体现出舒茨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以及米德对身体行为分析的结合和借用，同时也涵盖了舒茨对生活世界的社会分析。哈贝马斯也曾对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过总体式的描述，例如他将日常生活从金钱和权力系统中分离出来，强调这些系统是试图通过现代化和官僚化而渗透和殖民日常生活的。

亨利·列斐伏尔的第二个任务(与第一个任务紧密相连)即是对异质空间的提倡。抽象空间几乎就是现代主义的代名词，而当代的社会理论则更注重对异质性的分析。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抽象空间和异质空间的论争中，亨利·列斐伏尔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城市中的异质现象就像城市自身一样古老。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

就有“城市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相似的人组成的城市不可能存在”的论述。特别是19世纪以后，城市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城市异质现象和多样性问题已变成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质。例如在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⑤的城市主义理论中即将异质现象与人口数量和密度作为城市的一个决定因素。路易斯·沃斯在关于城市里的陌生人的讨论中对城市生活异质性的强调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对异质性的强调在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简·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也提出要用陌生人聚集的观念来重新认识城市。因此，在某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城市生活本身就是由一个陌生人的世界所组成的。

亨利·列斐伏尔还进一步指出：空间的社会、心理和物质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关系。“形式随从功能”这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基本信条最终所体现的是空间的社会尺度和功能尺度都应该由其物质的因素来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机械决定论。将空间的物质尺度和社会尺度整合的企图，或换句话说，将人类实践作为物质空间的关联域，对于人们对空间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人们不能将自身所处的环境看作是一种物质材料之间毫无关系的堆砌，或将城市仅仅等同于所有建筑的集合；另一方面，如果将空间仅仅看作是承载社会关系的一种容器而在分析中缺乏一种物质尺度，那人们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空间。因此，各门学科尽管都有自己研究的侧重点甚至是偏差，但人们对于物质空间的感知、创造和使用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必须结合物质尺度和社会尺度，才能真正理解空间，理解人们自身所处的环境。

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对建筑学和城市学科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屈米就具有与亨利·列斐伏尔类似的思想。他认为：我们不能体验和思考我们所体验的。空间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空间的自身中。因此，解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矛盾的惟一方法就要从对客观对象自身的研究转向对发展过程的关注，将对空间本身的思考转向对空间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的关注，换句话说，也就是将对建筑(建筑学)的思考转向对建筑(建筑学)发展过程的关注。正是通过对空间形成过程的分析才能将空间的物质尺度和社会尺度相结合，只有通过这种认识的转换，人们才能弥合通过心理过程而形成的精神空间和通过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真实空间的分歧，才能摆脱因精神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关于空间认识的障碍。但实际上，屈米本人并没有沿着这种思路发展并用其实践来真正弥合精神空间和真实空间的分歧，而是转向了对真实空间、事件和功能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⑥

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戈特德伊纳(Mark Gottdiener)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指出：将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相调和，弥补了人文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种主要的城市分析方法的缺陷。根据芝加哥学派的定

义,人文生态学研究的是人和社会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分布的形成过程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规律,是人群的空间地理分布的各种社会原因和非社会原因。而马克·戈特德伊纳则认为人文生态学偏重的是人与社会互动的空间位置关系,但在理论上对这种空间位置关系的积极发展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思想,而且人文生态学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往往采取一维的和技术决定论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在另一角度对社会过程做出了较深入的理解(这种社会过程产生了城市空间),但政治经济学仅仅将空间看作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容器,忽略了人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弥补城市分析方法的缺陷,就必须实现空间认识形式的转换,将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转向对城市空间形成过程的研究。

阅读亨利·列斐伏尔理论,特别是《空间的生产》这样一本纯粹的社会哲学著作,对于没有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学人来说是很辛甚至是痛苦的。但庆幸的是,书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直接对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的讨论。例如他认为:吉迪翁在《空间,时间和建筑》一书中对空间历史的三个阶段划分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社会空间真实性所进行的转化,同时又指出吉迪翁的空间哲学存在着致命弱点:对欧几里得几何空间的预设,即将欧几里得空间看作是一种具有先在性的空间。潜在于吉迪翁空间哲学中的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在其后面的著作“The External Present”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些精彩评论的引领,才使得自己能通读全书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但由于亨利·列斐伏尔思想的深刻性和多学科性,很难说自己对其思想有着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如果能够通过本文简约的介绍而引发对《空间的生产》的阅读和研究,也就不枉自己的一番苦功了。

注释

- ① K. Michael Hays. Architectural Theory since 1968. The MIT Press, 1998, 189.
- ②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 Sacha Rabinovitch, Lodon, 1971, 142.
- ③ 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生产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作为纯存在或绝对原则的意识生产出了世界,其次自然又生产出人类,而人类则通过劳动和斗争生产出历史知识和自我意识。
- ④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美国现象学社会学家。著有《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生活世界的结构》等著作。
- ⑤ 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城市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成员之一。
- ⑥ 汪原. 城市、空间、事件. 建筑师(80).

“异托邦”概念的两个文本比较

随着西方形而上学权威性的不断式微，人文和社会学科开启了从时间(历史)分析模式向空间分析模式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引起了各学科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试图将空间分析置入后现代理论框架中，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作为体验和社会行动之场所的日常生活空间。

这种空间分析模式的建构首先是基于对笛卡儿空间体系批判，对这种与理性、秩序、等级和二元对立紧密关联的空间体系的批判也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批判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以包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代表的理论家，他们秉持着末世论的信条，批判笛卡儿空间对迪斯尼式的人类愉悦和狂欢的“真实”外表造成了威胁，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保罗·维里利奥(Paul Virilio)、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其二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德塞图(de Certeau)、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等理论家，尽管在观点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试图对不断分化的、功能主义式的、由电子掌控的日常真实性进行揭示和阐明，并在这种揭示和阐明中，坚持隐藏的但却明白清晰的行动和建设性介入的可能性，希望触发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

在这些理论家中，福柯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对社会空间的思考不仅具有直接的和明确的空间场所性，而且他关于妓院、监狱、精神病院等所谓“异托邦”(Heterotopia)的考察开启了社会空间研究的全新视点。

1984年，在福柯去世的短短几十天前，德国柏林展出了福柯早年的一批演讲稿，其中包括1967年3月在巴黎应邀出席建筑师组织的研讨会上的演讲。此前，该演讲稿一直没有公开，因此并未列入福柯的正式作品中。在福柯去世数月后，法文建筑杂志“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e”(Ocotber 1984)以题为“Des Espaces Autres”刊载了讲稿的全文，随后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以题为“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另类空间：乌托邦与异托邦)，并且以首篇的形式刊载于著名的建筑杂志“Lotus Internation”上(48/49, 1985)，1986年又重新刊载于“Diacritics”上，从此，“异托邦”(Heterotopia)

的概念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在这篇演讲中,福柯首先对西方思想史中的空间问题进行了简略的回顾。他指出:中世纪的场所(Places)是一种划分等级的系统,这些场所是神圣的或世俗的、开放的或封闭的、城市的或乡村的、超世的或现世的。这种等级化始终与场所相对或纠缠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世纪的所谓局域化(Localization)的空间。17世纪,伽利略不仅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而且断言了一种无限性和无限开放的空间。事物的位置不过是运动中的某一点,其静止只是运动的无限减慢,从此,场所化被绵延(Extension)这一概念所替代,空间维度被时间维度所统治,中世纪封闭的空间也为之解体。在当代,空间的分布(Arrangement)重新取代了绵延(Extension),它体现的是点与点、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邻关系,是系列和网络。^①

因此,福柯断言:我们这个时代是空间的时代,而空间则以一种秩序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简要地叙述了空间的历史之后,福柯向与会的建筑人士阐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异托邦”(Heterotopia),并详细地阐述了“异托邦”的六个主要原则。

第一,我们可以在任何文化和人群中发现“异托邦”的存在,虽然它们具有各种形态,并且任何一个形态都不具有普遍性。尽管如此,福柯仍将“异托邦”宽泛地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存在于所谓的原始社会中,是由具有特权的、神圣的或禁忌的场所组成,这类场所服务于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体,如青少年、老人以及处于经期的女性等;第二类存在于当代社会中,如沿袭19世纪形制的寄宿学校、兵营(在这些场所男青年可以远离家庭而具有第一次性体验)、火车和蜜月旅馆(是女孩初夜的地方)等。这些“异托邦”在当代社会中或已消失,或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如精神病医院和监狱,在这些场所中拘禁的是偏离了社会通常标准的人。福柯甚至将老人福利院也包括在其中,因为老人的行为已偏离以愉悦为准则的社会。实际上,对这两类“异托邦”之间历史的、现代化转化的追述几乎构成了福柯的主要工作。

第二,根据文化的共时性,“异托邦”随时间的变化,其功能和意义也发生变化,例如墓地。直到18世纪末,墓地仍位于毗邻教堂的城市中心,并始终与灵魂的不朽和再生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城市的健康以及倡导死亡的个体化,墓地随后被移至郊区,从而使每一个家庭都在“另一类”的城市中拥有了安息的场所。因此,每一个“异托邦”都具有一种赋有启示性的系谱和地理学因素。

第三,“异托邦”具有在某一真实的场所中并置多个异质空间的能力。在此,福柯考察的是各种空间会聚和交织的场所,它们类似于戏剧的方形舞台、电影屏幕和东方的花园(古代的波斯花园即被设计为现世

总体性的代表)。正是空间中差异性的复杂并置和世界的同时性,使“异托邦”充斥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没有这种充斥,空间将沦为固定的、僵死的、稳定的和非辩证的。

第四,“异托邦”与片断性的时间有着特别的联系,鉴于术语的对称,福柯称之为“异时间”(Heterochronies)。这种空间与时间的交会以及空间的时段化,使“异托邦”在一种有迹可寻的地理学意义中发挥着充分的效用。在现代世界中,许多特殊的场所就记录了时间和空间的这种交会,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就是无限积累的时间的“异托邦”,博物馆和图书馆即显现了外在于时间自身的场所,它试图将所有时代和事件会聚在一个空间中。此外,还有在时间上更短暂和不稳定的空间,例如用于节庆的场所、露天集市等。透过迪斯尼式的世界,福柯看见了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形态在简练的、有漂亮包装的环境中不断地会聚,这种环境似乎既对时间和文化进行废除,又对它们实行保留,既体现出暂时性,又折射出永久性。

第五,“异托邦”始终预设了一个开放和封闭的系统,这种系统使得“异托邦”既隔绝又可进入,而进入和离去则是以多种方式实行控制的,其强制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监狱和军营。与此相对的是更具开放性的场所,如巴西的一些传统住宅,任何过路的人都可推门进入房屋甚至留下来宿夜。尽管这类住宅形式在西方文明中已经消失,但为成年人提供自由、率直的性爱行为的美国汽车旅馆具有类似的性质。在上述场所中,对“异托邦”在场和不在场的监视以及行为的划分和内与外的定义等,使“异托邦”具有了领域性的品质。这种对开放和封闭所实行的控制暗示着权力和惩戒技术的运用。

第六,“异托邦”具有与所有的空间发生联系的功能。在每一种人类栖居的环境中,栖居者被强调幻觉和错觉的同时性愉悦所困惑。换句话说即一方面“异托邦”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空间,从而揭示出所有的真实空间是如此的虚假,所有生活中的场所是如此的碎裂;另一方面,它又形成另一种真实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呈现出完善的、谨慎的和精心并置的状态。^②

二

从上述对“异托邦”特征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福柯仍然延续着空间的二元对立逻辑,如公共与私密、家庭与社会、文化与使用、休闲与工作空间等。“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的建立也始终与乌托邦对立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字面上所体现的,乌托邦具有一种幻想的特性,它不是一种真实的所在,“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所在地,还是存

在着一个它们可以在其中展露自身的奇异、平静的区域；它们开发了拥有康庄大道和优美花园的城市，展现了生活轻松自如的国家，虽然通向这些城市和国家的道路是虚幻的。”^③ 尽管乌托邦不具有真实的场地性，但它仍然具有空间的特性，而且乌托邦在总体上与社会的真实空间具有一种直接的、可转化的、类似性的关系，例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想象、可能性和希望，也同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模式；与此相反，“异托邦”所勾勒出的则是一种在社会真实塑造中现实存在的场所，是社会生活预设的组成部分。它类似于反向场地(Counter-site)，外在于并根本区别于所有其他的空间，同时又与通常的社会空间和秩序发生关联和与之共存。“异托邦”的这种差异性存在于同一性和共有的空间性之上或反面，并且在社会根本的基础上不断得以建构和形成。

福柯用镜子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乌托邦和异托邦之间，存在着某种混杂的经验，这种经验带有这两种类型场所的品质，就好比镜子。镜子(的世界)毕竟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个非场所性的地方。在镜子中，在其外表背后潜在敞开的一种非真实的空间中，我看到了并不存在于其中的我自己，我就处在我并不存在的那个地方，一种使我的外观向自己显现的阴影，使我能够在我所不在的那个地方看到我自己，一个镜式乌托邦。与此同时，我们也涉及了一种异托邦。镜子真实地存在着，并具有某种反射我占据的场所的效果：事实上，从镜子中，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就在那里。”^④

三

“异托邦”的概念并非首次在该演讲中出现。在1967年出版的《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尽管该演讲与《词与物》的出版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但两个文本关于“异托邦”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在《词与物》中，异托邦(异位移植^⑤被定义为大量断裂的，无法比较的，但又是可能的秩序和世界在一种不可能的空间中的共存，例如“属皇帝所有，有芬芳的香味，驯顺的，乳猪，鳗鲡，传说，自由走动的狗，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发疯似地烦躁不安地，数不清的，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等等，刚刚打破水罐的，远看像苍蝇的”。^⑥ 显然，这些要素不是按照类型原则或在同一范畴之下进行划分的，这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异类要素的并置对于我们通常的秩序感是如此的不协调和具有分裂性，以至于我们无法在一种连贯的和熟习的领域中认识和把握这种反常性。但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清楚地将对“异托邦”的

讨论集中在语言学范围。他指出：“异位移植(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用我们用以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与物结成一体的不太明显的句法……异位移植(异托邦)使语言枯竭，使词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移位移植(异托邦)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竭无味。”^⑦

而在《不同的空间》一文中，福柯将“异托邦”描述为一种异类场所(Heterogeneous Site)，是一种绝对的他者，是一种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的外在的空间，它能够在单一的真实空间中并置各种相互矛盾的空间，在此，福柯所思考的是超话语(Extra-discursive)的真实场所。

福柯认为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思想^⑧和现象学家的描述不仅开启了空间的感知维度，而且使人们认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和真空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浸透了各种品质(性质)的、光怪陆离的空间中。但巴什拉和现象学家所关注的是寓于主体对空间的内在感知，而福柯所要讨论的则是外在空间，是一种具有真实场所性的空间，是一种存在于任何社会、文化和人群中的物质空间，是一种能够将从自身中抽取出来的空间，是现实生活受到侵蚀、时间和历史得以发生的空间，是一种令人苦恼但又无法摆脱的空间。

这些异类空间和场所常常被过分强调经验的晦暗性和观念的明晰性这种思维方式所遮蔽，对“异托邦”用经验几何学和相关的空间科学等传统方式的描述，必然会忽略和掩盖“异托邦”的意义以及“异托邦”与所有其他真实场地之间构成的张力和矛盾。因此，为了寻找和发现这种隐藏的、赋有人类地理学意义的空间，就必须借助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解释模式，福柯将这种分析方法或解释模式称为“异质拓扑学”(Heterotopology)。因此，福柯显然是想将“异托邦”从意象的空间思维中提取出来，并与日常生活的环境进行区分，试图建立一种隐藏的但显然又可以操作的差异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使一种清晰的、在空间上呈现非连续性的场景和概念在社会空间连续性背景的反面呈现出来。例如博物馆、监狱、医院、墓地、剧场、教堂、兵营、妓院等这些所谓的“反向”场所都提供了对社会秩序最敏感的认知，这些认知或许可以从非秩序的和多样性的品质中生发，从而揭示日常现实的杂乱和病态的建构特性，这些奇异的场所被社会性地建构，同时又再创造和揭示了社会存在的意义。

尽管在两个文本中，“异托邦”都被作为一种绝对异质性空间的概念来对待，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并不想将“异托邦”作为某种可操作的概念，而是借助语言学的证明来显示西方思想体系的局限性。